

孙中山著作传播研究

何建国◎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孙中山著作传播研究

何建国◎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中山著作传播研究 / 何建国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 - 7 - 5161 - 4334 - 6

I. ①孙… II. ①何… III. ①孙中山(1866~1925)—著作研究
IV. ①D69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305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吴丽平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39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现状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研究现状	(4)
第二节 概念及研究范围	(6)
一 概念的界定	(6)
二 研究范围	(9)
第二章 孙中山著作的神圣化	(10)
第一节 孙中山形象的演变	(10)
一 “逆首”、“孙汶”与“孙大炮”	(10)
二 “中山”与“国父”	(13)
第二节 “圣经”地位的确立	(16)
一 恭诵总理遗嘱	(16)
二 胡适与孙中山著作	(27)
第三节 群体化与时代化的孙中山思想	(33)
一 从个人思想到党义	(34)
二 从党义到意识形态	(39)
第三章 孙中山著作的学术化	(42)
第一节 初期的党义研究会	(43)
一 党义研究会的成立	(43)
二 党义研究会的成果	(50)

第二节 研究工作的全面开展	(54)
一 国民党的重视	(54)
二 学术团体的建立	(60)
第三节 孙中山著作的研究成果	(70)
一 主义学术化	(70)
二 主义学术化成果	(80)
 第四章 孙中山著作的教育植入	(90)
第一节 从党化教育到三民主义教育	(91)
一 党化教育的缘起	(91)
二 党化教育在广东	(94)
三 教育方针的确立	(97)
第二节 课程的设置与教科书的编审	(101)
一 课程的设置	(101)
二 教科书的编纂	(108)
三 教科书的审查	(117)
第三节 课堂教学的实施	(125)
一 课堂教学的开展	(125)
二 课堂教学的效果	(133)
 第五章 孙中山著作的宣传渠道	(144)
第一节 孙中山著作的传播主体	(144)
一 孙中山对其学说的宣传	(144)
二 国民党政要对孙中山学说的宣传	(147)
三 基层国民党党员对孙中山学说的宣传	(151)
四 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宣传	(154)
五 国际友人对三民主义的宣传	(156)
第二节 孙中山著作的传播方式	(157)
一 建立宣传机构,培养宣传人才	(158)
二 宣传书刊的编印	(159)
三 传单的散发	(164)

四 宣传品的审查	(168)
五 演讲宣传	(171)
六 社会教育宣传	(177)
七 叛变人员现身说法	(186)
八 艺术宣传	(188)
九 读书运动	(190)
第三节 宣传工作的弊端	(193)
一 宣传经费的短缺	(193)
二 宣传工作的缺陷	(197)
三 宣传技能的低劣	(203)
四 宣传渠道的阻塞	(206)
结语	(211)
参考文献	(216)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现状

一 问题的提出

梁启超曾说,“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于一个人之个性”。^①对这句话的理解,前辈史家陈旭麓先生认为,“这话的前者是说少数个人的先进思想散播为社会思想;后者则是说一个时代、一个集团的思想必然依托于个人。”^②在两位前辈史家的启发下,本书拟循着这一思路出发,通过对孙中山著作传播的研究,来探讨民国时期孙中山的思想如何由最初个人的思想演变为群体(党)的思想,最后被确立为一个时代(国家)的思想而上升为意识形态,试图揭开梁氏之所谓的“历史秘密”。

孙中山的研究,在中外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旅程。正如尚明轩先生所言,孙中山研究经历了初始、复苏和前进三个阶段,积累了丰富的成果。据尚明轩先生统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孙中山的研究专著、译著、资料汇编和相关的图录等有600多种,刊发于报刊的文章已达10000多篇,甚至有发展成独立的史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44年版,第114页。

^② 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四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134页。

学分支的趋向。^① 仅1997—2006年,有关孙中山的研究著作就达72部,发表的论文总数为1473篇,各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举办20余次,平均一年举办两次。内容涉及孙中山的思想、孙中山与近代化、孙中山与世界、生平与事功以及与同时代人物的比较研究等方面。^② 然而,纵观这些研究成果,从研究内容来看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主要集中在对孙中山思想的阐释,二是重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政治活动。从研究方法来看,大体不脱“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两种路径模式。从时段来看,主要集中在对孙中山身前的研究。

近年来,在学者们呼吁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概念和理论的路径^③及新文化史的勃兴下,孙中山的研究视角与方法逐渐发生变化,由身前转入身后,涌现出一批富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如:潘光哲的《“国父”形象的历史形成》、《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李恭忠的《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汪利平的《创造一个民族符号:南京的孙中山纪念物》、陈蕴茜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等。这些论著均在不同程度上将孙中山研究的重心从孙中山身前转到身后,对南京国民政府建构孙中山的形象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所有这些成果,无疑深化了我们对孙中山的认识。问题在于,学术界对于记录文本内容的载体——孙中山著作的传播过程,及其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之关系,则甚少有人涉足。作为一个到目前为止仍在海峡两岸及国内外继续出版,在相隔几代人中仍然产生影响的特殊文本来说,这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孕育孙中山著作产生的时代——中华民国时期,孙中山作为当时执政党的创始人,他的著作传播的整体脉络以及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晰。唯其如此,本书以此为题,对孙中山著作在民国时期的传播进行系统的研究,就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学

① 尚明轩:《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来孙中山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② 王杰、张金超:《跨世纪的孙中山研究(1997—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40页。

③ 参阅拙文《中国史研究的路径:从悖论到理论》,《史林》2009年第4期。

术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孙中山作为海峡两岸共同认可的人物，他不仅属于中国，同时也是属于世界的一位知名人士。以孙中山著作传播为研究课题，不仅是为了寻找某种学术研究的视角，或者为孙中山研究尝试一种新的思路，更为突出的是孙中山本人在中国近代历史地位的重要性。

孙中山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晚清以来中国人民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代表，中共的历代国家领导人都给予高度评价。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1956年11月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时说：“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② 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之际，邓小平为孙中山铜像揭幕题词：“伟大的革命者孙中山先生永垂不朽！”江泽民在2001年10月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讲话中认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实践，对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和深远的影响。这是辛亥革命伟大精神所在，也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之所在”。^③ 胡锦涛在2006年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对孙中山的历史地位给予高度赞扬。^④ 因此，对为中华民族作出杰出贡献的领袖人物的著作传播进行研究，深入认识他所领导的革命事业轨迹和总结历史经验，以及认识当代世界范围内政治人物著作的传播具有启示性作用。

其次，由于孙中山身份的特殊性，他的著作传播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政治文化攸关政治信仰的重建，政治正当性的获取及国家兴亡的变迁，因此它对民众的教化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作为教化和规训民众的主要读物，儒家经典为历代所传承与延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99页。

②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光明日报》1956年11月12日。

③ 《中国共产党党史工作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党史工作年鉴200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④ 参阅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人民日报》2006年11月13日第1版。

续，构成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儒学之外，帝王的诰、谕也成为节民性、兴民德的重要内容。如，明代洪武十八年（1385）颁行之《大诰》即为劝导民众以信仰其治道。在清代，帝王的诰、谕不仅是教化民众、维系社会安定的依据，也成为科举命题取士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康熙、雍正时期所形成的《圣谕广训》，不但是官、民的必备书目，而且对它的宣讲与推行形成了明确的日期与仪式，成为地方官员施政的内容之一。尤为注意的是，《圣谕广训》与儒学经典并置成为科场中学子求取功名的必考科目，为有清一代治国安邦、训育民众的一项制度设计。^①

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语境中，领袖著作，特别是执政党领袖著作的整理、编辑、传播，向来被视为政治生活中一项极其庄重、严肃的大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国民党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的著作成为国民党党员的必读书目，对其著作的宣传、推广成为国民党各级宣传部门的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工作，甚至是首要的工作。因此，孙中山的著作不仅是一种思想文化现象，更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就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一个执政党领袖著作的传播不仅具有文化史的意义，更具有政治史的意义。

二 研究现状

本书将孙中山著作的传播纳入国家政治活动和民众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而不是将它置于某一行业中作专题史研究。通过梳理中国国民党对孙中山著作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等不同场域的推广与渗透，揭示国民党对孙中山著作宣传的具体途径与策略，展示中国国民党建构意识形态的面相及其意识形态建构的最终效果。

关于国民政府的意识形态研究，较具代表性的是高华、江沛等学者的研究成果。2000年3月，江沛、纪光亚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进行研究，出版了专著《毁灭的种子——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研究》。该书从“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法律党释”、“文化

^① 详情参见王尔敏《明清社会文化生态》，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29页。

弹压”、“伦理误导”、“教育党化”、“舆论钳制”、“摧残文艺”九个方面论述了国民党对意识形态的管理，认为其大致具有高度集权、党化一切、特务横行、标榜民主四个特点。最后结论认为，国民党为了确保其在政治上的地位，在中国实行严厉的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的愚民政策，对意识形态的管理是极为专制的。^①

高华在《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一文中认为，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修正破坏了其动员型意识形态的结构完整性。经过调整的三民主义，缺乏理论的严肃性和内涵的规定性。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脆弱性及其与现实的严重脱节，最终使得难以成为严密的意识形态，发挥整合社会的作用。^②

此外，严海建的《浅析 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意识形态层面的劣势》一文，也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认为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共产党相比始终处于一种劣势，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由于三民主义本身的肤浅，缺少学理上的支持；清党反共和与时代精神相脱节的宣传；蒋介石的军事统治思想；党内派系的斗争所造成的分裂与破碎以及国民党执政后自身实力的制约。^③

客观而论，高华的论述无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它的重点是就国民党意识形态本身的缺陷及原因而言，但没有论及国民党构建意识形态的过程、手段、策略以及最后的效果，当然这不是一篇专题论文中一个小节所能涵盖的内容。严文则基本没有脱开高华的思路。《毁灭的种子》一书探究国民党管理意识形态的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所选取的几个论域的确是国民党建构其意识形态的几种不同面相与策略，但尚停留于描述现象和分析特点的“是什么”的静态阐释，而对于国民党管理意识形态的结果，即“怎么样”并没有说明。

纵观上述研究成果，诸位学者对国民党意识形态的研究都是从思想精神和政治统治的层面出发，而没有关注在渗透意识形态的过程中社会

① 江沛、纪光亚：《毁灭的种子——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8—33 页。

③ 严海建：《浅析 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意识形态层面的劣势》，《民国档案》2006 年第 2 期。

各阶层的理解、感受和态度。也就是说，其忽略了意识形态对个人控制层面的研究，缺乏对日益渗入社会各个层面的意识形态进行原子式的分析与解读。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的著作作为国民党构建其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资源，被捧为圣经，广泛传播。而既有的成果没有从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主要理论资源——孙中山著作这一视角切入来审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它的优劣效果。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书以孙中山著作的传播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孙中山著作在民国时期的传播途径及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试图解答南京国民政府怎样宣传孙中山的著作来构建其意识形态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探究出版物与国家政治活动的相互关系，进而揭示孙中山的思想如何由最初个人的思想演变为群体（国民党）的思想，最后确立为一个时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国家的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中作为统一行动的指针实际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第二节 概念及研究范围

一 概念的界定

（一）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我们在阅读中经常碰到的一个词汇，然而由于阅读语境的不同，人们赋予它不同的含义。也正是由于它自身承载了丰富的内涵，从而使人们对它的理解千人千面，见仁见智。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本身的不确定，具有多种歧义。的确，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不同的学术语境下“意识形态”呈现多种意象，如在哲学和政治学领域中就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为了本书研究的需要，有必要对这一概念作一具体的说明。

“意识形态”（英文为 Ideology，有人译为“思想体系”）一说最早起源于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奠基人是法兰西研究院院士政治学家、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特拉西在《思想体系

原理》中认为,“意识形态”是一门思想科学^①,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观念”的科学。作为观念学的意识形态在特拉西那里是有确定的含义,其目的是要建立一门基础性的哲学理论。到拿破仑时期,由于特拉西等人被认为是“空想家”,“意识形态”这个词也由最初进步的、积极的褒义词变成了贬义词。^②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的论述,使得这一概念广为流传。尽管马克思是在批判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但其概念的确切内涵仍然并不清晰。^③此后,西方的社会理论家曼海姆、韦伯等人以及阿尔都塞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学派等对意识形态展开了不同程度的论述,甚至有人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论。^④这些不同层面的论述,一方面使意识形态从最初的哲学范畴转到了社会学、政治学范畴,无疑对丰富和发展意识形态理论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使意识形态呈现为一个富有争议性的概念,对它的解释层出不穷,很难达成共识,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正如有的学者所总结:“意识形态被用以广泛的指称,观念、理想、信仰、情感、价值、世界观、宗教、政治哲学、与道德判断等。”^⑤

国内学术界对意识形态的含义看法也不尽一致,有的学者将它的含义表述为“在有阶级的社会里,社会意识形态是直接或间接反映社会的经济及政治的特点,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力图保持或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思想观点的体系。”^⑥也有学者将它表述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⑦

有鉴于此,本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政治学范畴中的

① [英] 邓肯·米切尔主编:《新社会学词典》,蔡振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

② 详情参阅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6页。

③ [英] 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孔兆政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4页。

④ 同上书,第106—118页。

⑤ 张明贵:《意识形态与当代政治》,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7页。

⑥ 肖前等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页。

⑦ 宋惠昌:《当代意识形态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10页。

“意识形态”的意义，即把意识形态当作是一个政治概念。本书的“意识形态”是指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是某一阶级或集团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而推行的一套思想信仰或观念体系，它规训全体社会成员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忠诚和信任，引导人们对国家的合法性及正当性产生认同感。

（二）党义

党义是指国民党的主义。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什么是国民党的主义曾有过如下说明：“国民党之主义维何？即孙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义是已。”由此看来，党义似乎主要是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①

实际上，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8年7月颁布的《政军警各级机关工作人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和1929年10月颁布的《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内容来看，前者的党义是指《三民主义》、《民权初步》、《五权宪法》、《实业计划》、《建国大纲》、《孙文学说》以及国民党历次重要宣言及决议。后者的党义是指《孙文学说》、《军人精神教育》、《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五权宪法》、《民权初步》、《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实业计划》。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孙中山的著作都是中国国民党党义的核心内容。党义基本上涵盖了孙中山所有自成体系的著作，并非仅局限于《三民主义》，而且党义的范围远远大于孙中山的著作。

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国民党的党义也并不仅仅是《三民主义》。如有人认为，“中国国民党党义，尽创于中山先生一人之手，其最大者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总理遗嘱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②还有人认为，“所谓党义，当然是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③

^① “三民主义”这一名称的运用经历了从起初“三大主义”到“三民主义”转变的过程。详情参阅拙文《孙中山公开使用“三民主义”一词时间考》，《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② 王恒：《中国国民党党义》，上海革新评论社1928年版，第7页。

^③ 陶百川：《怎样研究党义》，王新命、汪长济编《现代读书的方法》，现代编译社1935年版，第175页。

因此，党义不仅是指孙中山的著作，而且包括国民党的历次宣言及决议。很显然，宣传党义、研究党义当然也包括宣传、研究孙中山的著作。

二 研究范围

本书以孙中山著作的传播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孙中山著作在民国时期的传播情况及相关问题。从时段来看，主要集中于五四运动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 1919 年到 1949 年这 30 年的出版状况。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段，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因为孙中山较为系统的著作大多是在此期间完成；二是中国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后，孙中山被尊为“国父”，他的著作被奉为“圣经”，大量编辑出版。研究一个执政党领袖著作的传播是本书的主旨。因此，本书重点关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著作的传播活动。汪伪政权时期以及 1949 年以后国民党在台湾的出版情况则暂不列入本书的考察范围。

从地域来看，孙中山的著作曾在日本、英国、美国、德国、苏联等地出版，对于这些地区孙中山著作的传播情况，因与本书主旨关系不大，不作展开论述。

第二章

孙中山著作的神圣化

孙中山著作的传播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这个曲折的历程是与孙中山个人地位和形象的变迁交织在一起的。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孙中山是通缉的罪犯、乱党的首领、讨伐的对象，他的著作只能秘密出版。孙中山逝世后，他所创立的中国国民党逐步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孙中山被尊为“国父”，他的著作被奉为“圣经”，成为中国国民党建构官方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孙中山著作的整理、编辑、出版、传播遂由秘密走向公开，由公开而走向神圣，并构成一种独特的现象。本章就这一现象作详细的梳理，探讨孙中山地位的演变及其著作神圣化的原因。

第一节 孙中山形象的演变

一 “逆首”、“孙汶”与“孙大炮”

由于孙中山从事于革命活动，因此他曾成为清政府通缉的对象。清政府曾悬赏十万金取他的首级。^① 1900年，惠州起义后，两广总督德寿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云：“奴才伏查逆首孙汶，以漏网余凶，游魂海外，乃敢潜回香港，勾结惠州会匪，潜谋不轨……”^② 1907年，清政府在缉拿孙中山的电文中云：“查得逆首孙汶谋为不轨。其党为黄近午、柳际

^① 《悬十万金购孙汶首级》，《广益丛报》1908年第177号，上编，政事门：纪闻。

^②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载《民国丛书》第二编第76册，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98页。

贞、刘林生诸人，当分饬地方文武严密防缉。”^① 诸如此类关于“孙汶”、“孙汶逆谋”、“孙汶党羽”的报道在晚清的报章中是屡见不鲜。^② 在此，清政府在通缉令上故意把孙中山的名字“孙文”的“文”字旁边加上三点水，改写作“孙汶”，以示这是洪水猛兽一般的人，把他当作山贼草寇来缉拿。^③ 后来成为孙中山好友的林百克，曾因此在未见孙中山之前就一度把孙中山认为是个“盗魁”。^④

在革命党内部，虽然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正式当选为同盟会总理，其革命党领袖身份得到确认，但是在1907—1909年，陶成章、张继、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曾先后发起两次“倒孙”风潮。特别是陶成章联合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发表《孙文罪状》，表示“恶莠不除，则嘉禾不长”，提出九条罪状，与孙中山势不两立。^⑤

同时，在部分革命同志的眼里，有些人认为他不切实际，是个理想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孙大炮”（意思是空口说白话，瞎吹），并且讥笑他：“先生之志高矣、远矣，先生之策阔矣、深矣，其奈‘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何？”^⑥ 曾经追随孙中山在国内外进行革命活动的老人回忆，孙中山流亡海外之时，许多人不相信孙中山，并把他讥笑为“孙大炮”，甚至认为他是在骗钱。据这位老人说：有一次，孙中山在加拿大一间华侨餐厅吃饭，其中有一位华侨故意为难孙中山说：“孙文！孙文！你说要打倒清朝，请问你用什么兵力去打呀？”孙中山微笑着回答说：“乡里！我们有办法的，打倒清朝很容易，我们的军队多着呢！”“哈哈！什么军队？我只见你一个人在这里吃饭！”孙中山幽默地回答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0页。

② 参阅《英官责斥孙汶》，《大同报》（上海）1910年第14卷第13期，国外紧要新闻；《江督通飭各营严防孙汶逆谋》，《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7年第247号，要闻；《电告查获孙汶党羽之确据》，《广益丛报》1909年第217号，上编，政事门：纪闻。

③ 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31页。

④ 林百克：《孙逸仙博士与中华民国》，《孙中山全集续集》，上海三民公司1929年印行，“新序”第2页。

⑤ 详情参阅尚明轩主编《孙中山的历程：一个伟人和他的未竟事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22—449页。

⑥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0页。